

GUIDE FOR LITERARY ON WESTERN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ICS

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 理论与流派



樊勇明 主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

GUIDE FOR LITERARYON WESTERN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ICS

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 理论与流派



樊勇明 主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与流派/樊勇明主编.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ISBN 7-208-04466-X

I. 西... II. 樊... III. 世界经济政治学—著作—简介—西方国家 IV. F11-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106365 号

责任编辑 缪开金

封面装帧 王晓阳

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与流派

樊勇明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0.75 插页 2 字数 256,000

2003 年 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4,100

ISBN 7-208-04466-X/D·769

定价 22.00 元

前言

奉献给大家的这本国际政治经济学原著导读,所选篇目均是在西方学术界有相当影响和学术价值的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的主要著作。读原著是研究问题的基本手段,然而囿于各种原因,读原著又非易事。为此组织编写了这一本介绍性的读物,旨在把原著中的精华部分展示出来,以引起大家,特别是青年学子对阅读和钻研原著的兴趣,从而为推动建立和发展中国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学科而共同努力。

国际政治经济学是一门新兴的研究国际关系中政治经济互动机制的学科。这门学科于20世纪70年代开始在西方学术界兴起,起先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研究美国霸权衰弱的原因,探索“美国治下和平”的前途。在此过程中,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危机、全球环境恶化等问题也成了研究对象。冷战后,以经济技术为核心的综合国力竞争取代了以军备竞赛为主体的东西方对抗。在国际形势重大转折的推动下,国际政治经济学迅速发展。近年来,随着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兴起,国际政治经济学更是引人注目,几乎成为一门显学。

然而遗憾的是,国际政治经济学尚未成为一个有着完整理论体系的成熟学科,还需要不断地建设与完善。在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还只是刚刚完成对西方学术著作的翻译和流派的介绍,有中国特色的学术研究和理论构建工作都还只是停留在起步阶段。

为了吸引和聚集更多的人来研究以推动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我们选编了这本书供大家参考。参加本书编写的都是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国际关系专业的研究生。具体的写作分工如下:

《霸权机制:与其重建不如维现——罗伯特·基欧汉的〈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由陈霞、庄辉编写,《不对称的相互依存是权力的源泉——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的〈权力与相互依赖:转变中的世界政治〉》由沈奕斐编写,《从厂商自由竞争走向政府间战略博弈——保罗·克鲁格曼的〈战略性贸易政策与新国际经济学〉》由张建新编写,《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集大成——罗伯特·吉尔平的〈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由陈霞、刘刚编写,《成本与收益:国际体系变革的内在动力——罗伯特·吉尔平的〈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由吴新华编写,《世界经济的领导权和公共成本——查尔斯·金德尔伯格的〈1929—1939年世界经济大萧条〉》由沈逸编写,《全球化:对资本主义也是一把双刃剑——罗伯特·吉尔平的〈全球资本主义的挑战〉》由王莉编写,《不平等发展造就了贫困——萨米尔·阿明的〈不平等的发展:论外国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由汪晓风、叶青编写,《依附:发展中国家社会革命的经济根源——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的〈帝国主义与依附〉》由贺鸿昌、郭丽芳编写,《脱钩论:外围对宗主的激烈反抗——安德烈·冈德·弗兰克的〈依附性积累与不发达〉》由朱锦屏编写,《东方的兴衰:超越欧洲中心主义——安德烈·冈德·弗兰克的〈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由赵可金编写,《结构性权力:来自欧洲的观点——苏珊·斯特兰奇的〈国家与市场:国际政治经济学导论〉》由罗小军编写,《金融创新:既是天使又是魔鬼——苏珊·斯特兰奇的〈疯狂的金钱:当市场超过了政府的控制〉》由王珍、顾岳、苏强、叶青编写,《资本主义的机制、周期和趋势——伊曼

纽尔·沃伦斯坦的《历史资本主义》》由苏宗文编写。

从篇目结构来看,大体反映了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界的主要理论内涵,即相互依存理论、霸权理论和依附理论,因此罗伯特·吉尔平、苏珊·斯特兰奇和冈德·弗兰克等名家的文章就多了一些。另外,考虑到有关依附理论的著作和文章国内相对介绍得比较少,本书特意多选了些,以飨读者。

在成书之际,我衷心向上述参加编写的同学表示感谢。在成书过程中,陈玉刚老师、苏长和老师也做了不少工作,在此一并表示感谢。另外,王珏参与了本书书稿的打印工作,赵临利同学不仅参加了此书的打印、校阅工作,还参与了此书后期编辑、组织工作,在此表示深切的感谢。

樊勇明

2002年8月

中国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构建

(代序)

国际政治经济学是 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在国际学术界勃兴的一门新的前沿学科。在西方各国的高等院校中,国际政治经济学早已登堂入室,成为大学文科教育中的重要领域之一。从 1985 年起,美、英、德、法、日等国学者开始联合出版《国际政治经济学年鉴》。在中国,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和研究虽然起始于 80 年代末期,但发展十分迅速。迄今为止,不仅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主要著作都有了中译本,而且由中国学者编著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教材也纷纷问世。其中,有关专题的研究性著作更是百花齐放。

据手头现有资料表明,将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介绍到中国的第一本学术译著是重庆出版社于 1987 年 10 月出版的由吴元湛、何欣和刘学中等人译的瑞士的布鲁诺·弗雷(Bruno S. Frey)所著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译者们在翻译这本书时,并未意识到他们是在无意中翻开了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新一页。在该书的“译校者的话”中,译者们只是注意到了作者运用公共选择的分析方法来分析国际政治和国际经济,而未提及国际政治经济学正在西方学术界兴起这一重大事实^①。

时隔两年之后,1989 年当经济科学出版社推出由杨宇光等人译的美国学者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著的《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时,中国学界对国际政治经济学这门新学科产生

了异乎寻常的兴趣和关注。著名国际关系学者刘同舜教授在为该书作的序中不仅意识到了国际政治经济学已在西方学术界兴起的现实,并且看到了这门新学科的巨大发展前途。他认为“全世界的东西南北关系和全球性问题都可归入这一范畴”^②。

1990年,杨宇光教授又将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另一位巨擘苏珊·斯特兰奇(Susan Strange)的《国家与市场:国际政治经济学导论》一书译出。杨宇光教授在该书“译者的话”中明确指出,国际政治经济学已经在西方学术界脱颖而出,并得到引人瞩目的发展。此外,他还指出,在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历程中,中国应当、也能够有所作为。他希望他的译作能为中国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提供借鉴和资料基础^③。

其后,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Keohane)、约瑟夫·奈(Joseph Nye)、查尔斯·金德尔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Theotonio dos Santos)等人的著作也陆续被译成中文。

在大量译著出现的同时,不少中国学子在西方留学、讲学的过程中也已经敏锐地注意到了这门新兴学科。他们经过咀嚼消化之后,写出了一批有价值的作品。王逸舟在《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的有关章节里对国际政治经济学作了介绍。王在邦、秦亚青、王正毅、刘靖华等人开始运用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来观察、论证和分析现实的国际问题,推出了《霸权稳定论批判——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历史考察》(时事出版社1994年版)、《霸权的兴衰》(中国经济出版社1997年版)、《边缘地带发展论——世界体系与东南亚的发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霸权体系与国际冲突——美国在国际武装冲突中的支持行为(1945—1988)》(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等优秀的专题研究著作。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工作也在中国各主要高校展开。

1994年中国人民大学已经在本科生和研究生中开设相关课程。几乎是与此同时,复旦大学也在本科生和硕士研究生中开始了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教学,2001年起还开始招收该方向的博士生。为满足大学教学的需要,一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教材也陆续问世。其中主要有中国人民大学宋新宁、陈岳两位教授合著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复旦大学樊勇明教授的《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和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国际经济社会文化研究所的彭澎教授写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

综上所述,中国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从翻译到专题研究,再到整体教学已经有了15年的时间。不仅有了一批著作,而且也形成了一支队伍。可以说,一门新的学科已经基本建立起来了。

但是,应当承认,国际政治经济学还是一门年轻的科学,即使在西方学术界也鲜有人称国际政治经济学已到达了成熟的阶段。在中国,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和研究至多也只是一座新大厦刚刚完成破土打桩,备好了砖瓦建材,尚未搭建成形。

任何一座大厦的建设都离不开一个清晰的、完整的构建蓝图。国际政治经济学这座学科大厦的建设亦不例外。什么是国际政治经济学?它的研究对象是什么?国际关系中的政治和经济又是如何互动的?这些正是这张建设蓝图中三个最为根本的理论问题。

一、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定义和研究对象

要弄清楚什么是国际政治经济学,至少要从定义、研究对象和理论来源三个层次作出回答。为了叙述上的方便,同时也考虑到完整性和可比性,本文只局限可用于教学的综合性著作,即

《国际政治经济学概论》(以下简称《概论》)、《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以下简称《西方》)和《国际政治经济学》(以下简称《国际》)三本著作来展开分析比较。

首先来看一下对国际政治经济学定义的界定。

《概论》一书在三个地方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含义作了界定。该书开宗明义地提出国际政治经济学是“国际关系研究领域中的一门交叉性边缘学科”^④，“顾名思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就是运用政治经济学方法研究国际问题”^⑤。在分析了国际政治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和国际关系学的关系之后，作者又进一步明确：“在我们看来，国际政治经济学可以定义为：研究国际关系中的各行为主体之间政治经济相互作用的一般形式和普遍规律的一门新兴学科”^⑥。

《西方》一书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定义相对来说较为简单直观。它认为“国际政治经济学就是一门研究国际关系中政治与经济互动的新兴学科”。该书还形象地比喻说，在国际关系中，国际政治好比纵轴，国际经济好比横轴，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任务就是要解出这一纵一横两个坐标上的各种参数是如何结合变化的^⑦。

《国际》一书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界定则有两个提法。一个提法是“国际政治经济学是一门新兴学科”，“又是一门交叉学科，是国际政治学和国际经济学的交叉研究”^⑧。另外一个提法是“国际政治经济学是研究国家、跨国公司和国际组织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作用和相互影响的理论，是研究国际政治和国际经济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学问，是国际政治学和国际经济学的交叉学科”^⑨。除了这两种提法以外，作者在论及国际政治经济学性质时还强调说，在西方经济学中找不到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地位，“国际政治经济学实际上是政治学的分支——国际政治学的分支——国际关系学的分支”^⑩。

上述三本书在对国际政治经济学下定义之前,都对西方学术界的有关提法和界定作了认真的考察,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通过上述三种定义的比较不难发现:

第一,他们都把国际政治经济学看作是国际关系理论的一个分支。这一点非常重要,它不仅是简单的学科分类问题,而且牵涉到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的问题。把国际政治经济学定位于国际关系的分支实际上有两层意思。首先,反映了当代学科发展中各学科相互融合交叉的大趋势。国际政治和国际经济密不可分。其次,国际政治经济学是在国际关系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尽管有人认为国际政治经济学是对国际政治学的超越^①,尽管国际政治经济学十分强调量化研究,并大量使用成本—收益分析、边际收益、边际成本以及公共产品等经济学名词和原理,但是国际政治经济学在本质上是一门研究国际问题、国际关系和世界事务的学问,凡不涉及国家之间关系、全球事务和国际体系的问题均不在其研究之列^②。因此,国际政治经济学最基本的思路和方法仍然是国际关系学的。例如,国际政治经济学中对各理论流派的界定划分就是完全承袭国际关系学的概念。它所讲的自由主义并不等同于经济学中的自由主义,它所讲的现实主义也不意味着经济上就一定是重商主义^③。《概论》更是把国际政治经济学作为新现实主义国际关系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④。

第二,虽然表述不同,但三种定义基本上都认定国际政治经济学是研究国际关系中政治与经济互动关系的学问。这与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把军事、外交视为“高级政治”,把贸易、货币等视为“低级政治”有根本区别。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出现标志着国际关系理论从更广阔的视野来研究问题,反映了国际形势的变化对理论研究的推动。尽管中国国际关系学界早就注意到经济问题对国际政治的影响,并对阿拉伯国家的石油武器、发展

中国家的债务和发达国家的新技术革命等作过深入研究,但也没有把研究经济与政治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问题提到学科的高度上来发展。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把国际政治经济学界定为研究国际关系中政治与经济互动关系的学问有着重大意义。

第三,在研究对象上,三种定义有很大的区别。《概论》强调的是各个行为主体之间经济政治互动的一般形式和规律。作者指出,所谓行为主体是指主权国家和国际组织、跨国公司、跨国银行、跨国政党等,“正是这些行为主体的对外政治经济行为构成了国际政治经济的基本内容,彼此间的相互作用及其结构形态构成了世界政治经济体系或‘秩序’。因此,国际行为主体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单位,也是我们进行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客体和基本的逻辑起点”^⑮。《国际》则明白无误地表示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国家、跨国公司和国际组织的地位、作用和相互影响^⑯。《西方》在定义中并没有明确研究对象是什么,只是在其它地方列举了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七大问题。它们是:(1)对国际范围内政治与经济互动的基本原理的探索;(2)对当代资本主义现状和发展趋势的研究;(3)对当代国际秩序的研究;(4)对不发达问题原因及其出路的研究;(5)对国际组织和国际政治经济合作的研究;(6)对国际货币体系、贸易和投资、经济援助与技术转让等重要国际经济问题的研究;(7)对各国外交政策中经济因素的研究^⑰。

从字面上分析,三种定义在论及研究对象时,实际上出现了两种倾向。《概论》和《国际》都倾向于从研究客体的角度来确定研究对象,而《西方》则主要是从研究内容的角度来确定研究对象。

从这三本著作的内容结构来看,《概论》虽然强调了行为主体,但是对国家、跨国公司和国际组织的落墨却不多,而对国际贸易、国际货币、国际投资以及地缘政治的来龙去脉则作了详细

的介绍和分析。虽然作者力图从中探索这些领域中政治与经济互动的形式和规律,但或多或少给人留下了它所主张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只不过是这些专门学科的综合而已的感觉,从而使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学科立足点受到了质疑。

《国际》虽然在定义中十分强调国家、跨国公司和国际组织的地位和作用,但是作者又明确指出,国际政治经济学涉及的领域有:世界市场的发展、全球生产模式、国际分工、贸易及商品结构、国际资本流动、全球金融及投资、区域化、不发达问题等。在本书中,除在分析国际直接投资时对跨国公司有所涉及外,其它的都是立足于对国际金融体系、国际贸易体系和国际财政的分析,这在实际上背离了作者所主张的研究对象,而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经济体制当成了真正的研究对象。

《西方》一书则是明确地把重点放在对战后国际贸易体系、国际金融体系、全球化、区域经济合作和南北关系的分析上。在这一点上,《西方》一书明显地受到了吉尔平所写的《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的影响。

简而言之,三种定义在研究对象上无论是从字面上还是从内容上都没有取得统一,形成了三种各有侧重的研究视角。实际上,在国际学术界中,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也尚未有一个统一的说法。例如,被视为国际政治经济学创始人的罗伯特·吉尔平和苏珊·斯特兰奇对此就有着完全不同的理解。吉尔平是以战后国际经济体制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他在其集大成之作——《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中分门别类地对战后国际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了理论上的阐发和分析,包括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主体的国际金融体系、以关贸总协定为主体的国际贸易体系和以发展模式、债务危机等为主要内容的南北关系等等。然而,斯特兰奇却另辟蹊径,提出了结构性权力的概念,并衍生出安全结构、生产结构、金融结构和知识结构四种权力,

以及运输结构、能源结构等次权力结构。其分歧之大,远过于中国现有三种观点的分歧。也许这样的类比可能不太合适,但却反映了在这一问题上学术研究存在分歧的事实。

但是,从西方从事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学者的总体状况来看,把国际经济体制尤其是战后国际经济体制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力图探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贸易组织(WTO)等所代表的国际经济体制内所包含着的国际政治和国际经济相互作用的奥秘的人占大多数。

二、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渊源

与定义和研究对象密切相关的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来源。究竟是传统的政治经济学,还是国际关系理论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母体,对此三本书有两种不同的理解。

《概论》和《国际》两本书的观点基本一致。虽然它们都是从国际关系学和政治经济学两个方面来探寻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母体的,但都更侧重于后者。尤其是《国际》一书的作者更强调政治经济学对国际政治经济学形成和发展的理论哺育作用。作者运用了“复兴”和“超越”两个词来概括国际政治经济学对政治经济学的传承和发展。之所以用复兴一词,作者认为,从西方经济学发展史来看,所谓的经济学原本是政治经济学。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西方经济学的奠基人无一不称自己的学问是政治经济学,直到19世纪末,阿弗里德·马歇尔出版《经济学原理》后,经济学界才很少有人用“政治经济学”来称自己的学术。“政治经济学”则成为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专有代名词。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最高阶段》一书把马克思用于一国内生产方式的理论和方法扩展到国际上,从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由“国内政治经济学”向“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转变。战后兴起

的“新马克思主义”对列宁的许多观点作了更新发展,形成了观察国际问题的独特立场和方法,在西方学术界独树一帜。《国际》一书的作者认为国际政治经济学不只是政治经济学的简单复兴,而且是一种超越。其理由是现在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不仅恢复了同时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去考察分析问题的古典方法,而且极大地扩展了研究内容和视野。

《概论》一书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来源的分析更显得凝重。该书在两处提到政治经济学、国际关系学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影响。一处是论及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内涵,另一处是回顾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同《国际》一样,作者在回顾了政治经济学从合到分、再从分到合的历史之后认为“国际政治经济学就是在政治经济学的不断发展演变过程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也可以说是现代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必然产物”^⑮。对于国际关系学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相互关系,作者指出,国际关系学本身就包含了政治、经济、法律、心理和伦理、社会学等方面的内容。加之,从20世纪60年代起,经济学、行为科学等其它社会科学逐渐渗入国际关系学,许多政治学者和国际关系学者也积极引进经济学、行为科学的研究方法来研究国际问题。在后者的努力下,国际政治经济学逐渐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成为国际关系学的重要分支。为此,作者十分强调国际关系学和国际政治经济学密不可分,后者是在前者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⑯。然而,《概论》在论及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形成与发展时,又强调了政治经济学的作用,认为国际政治经济学既然是政治经济学的新表现形式和必然结果,其基本分析框架和理论基础在资本主义形成时期就出现了^⑰。这样,一下子就把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放入了政治经济学的框架之中。按这一思路,作者也就自然而然地把重商主义、古典政治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渊源了。

相对于《概论》、《国际》十分注意强调政治经济学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影响,《西方》一书则更加偏重强调国际关系学的理论意义。《西方》的作者把国际政治经济学完全置身于国际关系理论之中来寻找它的理论渊源,连重商主义等政治经济学的名词也基本上没有使用,直接从主导国际关系学发展的理想主义、现实主义来探寻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源头。作者绘制了一张国际关系理论系谱图(见图1),在图中对国际政治经济学作了明确的理论定位。当然,作者也未完全忽略政治经济学,而专设一节进行了相关论述。虽然作者在文中也回顾了政治经济学由合到分、再由分到合的历史进程,藉此来证明国际政治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有割不断的血缘关系,但另一方面又强调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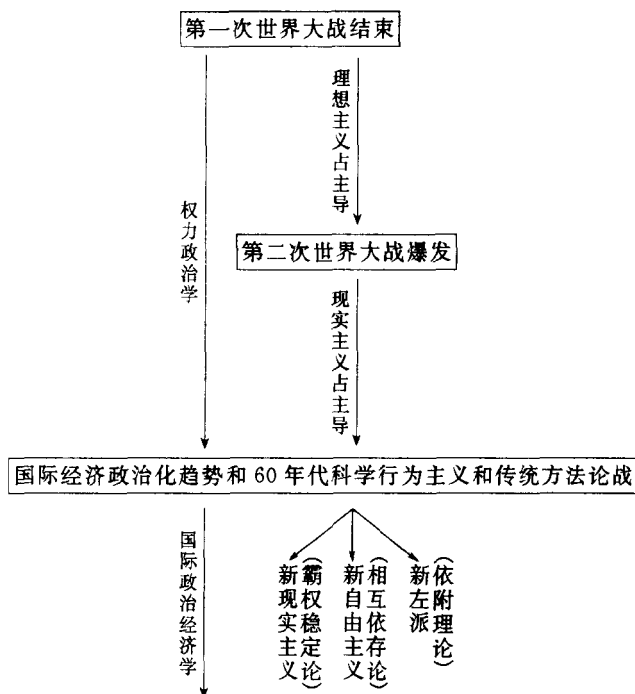


图1：国际关系理论系谱图

两者的区别。作者引用王逸舟的话说,国际政治经济学不是政治经济学的“机械放大”,而是“一种在更高起点的新综合”^④。

《概论》、《西方》和《国际》三本著作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渊源的不同看法,实际上反映了该学科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即如何看待政治与经济的相互结合、相互作用,进而言之是反映了对国际关系中政治经济互动机制研究视角的差异。

三、国际关系中政治与经济互动机制研究

对国际关系中政治与经济互动形式和一般规律的研究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能不能对国际政治和国际经济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途径和机制作出明确而扎实的理论阐述,是判别国际政治经济学能否独立自成为一个有发展前途的新兴学科的标志。

在中国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构建中,对国际关系中政治经济互动的研究大体上是沿着两个方向进行的。一是以《概论》为代表的,主要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又对经济基础起反作用的一般规律来研究国际关系中政治经济的互动问题。另一个则是以《西方》为代表的,力图从西方国际关系学界的最新研究成果中找到国际关系中政治与经济互动的特殊规律。

这两种不同的思路导致了对国际关系中政治与经济互动含义解释的不同。

《概论》认为,所谓的国际关系中政治与经济相互作用包含着下述四层含义。

(1) 国际行为主体对外行为之间的相互影响和作用。即国家、国际组织和跨国公司等国际关系中的行为主体所作出的对外行为对其它行为主体的影响和作用。